

# 母語

胡傑 (Christopher Hutton)、陶慧怡

## 母語的內涵

母語 (mother tongue) 是由一組相關但有不同含義的術語所組成，當中包括本地語言 (native language)、第一語言 (first language) 及家庭語言 (home language)。語言學家也使用像早期社會化語言 (language of early socialization) 的術語。要清楚了解「母語」的概念，首先我們要釐清當中的一個關鍵假設：母語是從家庭環境中透過非正式和自發的渠道學到，原型是來自於母親在早期和兒童的親密關係中的接合。這種通過吸收來學習的過程被認為是形成一個人的身分的基礎，並且為他們融入語言社會提供更多的幫助。從這個角度來看，母語為人類在地方和社區中提供了一個心理根源、確保了融合的連續性，並提供一個共同的 (如果能被想像的) 起源，以便作為人們的歷史出發點。

「母語」一詞並沒有單一的定義，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學習語言是一個動態過程，以及兒童學習語言的方式會隨着家庭、社區和社區之間的關係而改變。「母親」(mother) 和「舌頭」(tongue) 這兩個詞都有一系列的定義和隱喻意義。當中使用「母親」而不是「父親」

是因為它參照了早期社會化產生的理想形象。孩子從出生開始便在母親的餵哺下以自然和直接的過程吸收母語，而這當中並沒有任何安排或計劃，再而展開成為更廣泛的培育過程的一部分。英語術語「舌頭」(tongue) 主要表示講話——口頭的話語而不是書面的文字。母親與家庭(family)、家(home)和親密關係是有密切的聯繫；相反，「父親」刻板地表明家庭以外的世界以及工作、權威和法律的領域。所以「母語」代表情感和親密的強大紐帶；「父語」(father tongue) 則是權威、規則和生活制度的語言。

母語表明每個人只有一種母語，就像他們只有一個母親一樣。但是每個人的家庭語言環境可能不是單一方言或單一語言；每個家長可以說不同的語言，或者每個家長可以在兩個或更多的語言間切換。孩子可以因應對象來說不同的語言，或在家裏、學校教室或操場上用不同的語言。在任何情況下，語言並沒擁有明確的定義，而且不同語言之間的界限往往反映了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考慮。在學校使用的書面語言或其他語言可以被理解為家庭口頭語言的正式指標，而在某些情況下對這些語言又會有不一樣的詮釋。以宗教為例，使用的語言可能是熟悉的方言又或是相當不同的語言：在伊斯蘭國家的大部分地區，縱然阿拉伯語不是當地人的口頭語言，但是禱告和禮儀用的語言卻是古蘭經中的阿拉伯語。即使在使用阿拉伯語的情況下，口語的阿拉伯語、標準書面的阿拉伯語(例如在報紙或法律文件中使用的阿拉伯語)和古蘭經中的神聖語言之間卻存在着根本的區別。

從現代早期(1500–1700)開始，西方思想中的「母語」一詞的歷史便與白話主義、基督教內的語言政治以及宗教改革的語言戰爭聯繫在一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母語與自然、真實性、自我擁有權

和自主權是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在新教對宗教語言的理解中，禱告和奉獻的語言原則上應該是白話而不是拉丁語；聖經應該被翻譯成世界的「母語」，以便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被閱讀和理解。這能夠在日常世界和宗教世界之間建立共同的語言聯繫，允許想法和概念在恒常的生活語言中被內化，並從宗教領域流入日常生活。然而，這種白話模式否定了天主教會的作用，衝破它在權威和儀式上只使用拉丁語的束縛，使其不能作為崇拜者和宗教文本之間，乃至和上帝之間的罕有傳譯者。激進的新教徒拒絕了聖職的概念，並強調獲得宗教真理的平等。在這個「新教模式」中，寫作是附屬於言語；文字又是附屬於聲音；寫作不應過分偏離語言本身，而應該從其衍生出來，並保持它的口述精神：「律法條文帶來死亡，但聖靈卻賜予生命」（哥林多後書3：6）。

## 中國近代的語言改革

從母語的觀念帶出的政治理論是語言民族主義 (linguistic nationalism)。這反映了個人和團體身分的浪漫政治，其中所期望的是私人領域的語言 (母語) 與在教育、政府和法律等公共機構中使用的語言 (父語) 之間的高度連續性和一體化。母語民族主義通過第一社會化語言 (the language of first socialization) 在私人和家庭領域，再從學校，包括在教室和遊樂場，以及在政府、高等教育和主流媒體中的使用來尋求垂直整合。當與自主領土和政治主權的主張相關時，「白話主義」便是一個極端激進的理論。語言民族主義在削弱帝國或跨國政治等方面的潛力，已經在過去兩百年的歷史中得到證明。語言民族主義破壞了奧匈帝國的穩定，它亦與所有重要的政

治結構相對立，當中包括像大英帝國一樣的殖民地，像沙俄或奧斯曼帝國一樣的王朝，或者是前蘇聯的列寧主義者。

中國詞彙「母語」，至少作為一個政治術語，被推定為最近才加入中國詞彙的，這反映了身分全球化、傳教的現代性及其殖民主義的內部矛盾在19世紀後期對殖民主義的影響。母語的概念在大一統帝制社會秩序中並無地位，因為在那裏尋求的是對於非本土語相關的經典集語的征服。但從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1924）開始，語言便在有關中國現代性的辯論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在創造「我手寫我口」的現代書面中文——白話文。母語與舊有語言文化和關於現代性的激烈辯論之間的互動使它被同化和轉化。雖然中國的現代性同時意味着方言的現代性，然而這卻是從國家建設而不是身分認同方面的理解着手。「我手寫我口」的原則從來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它表示了一種書面語言應和口頭語言一致的希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中並不一定包括對母語的肯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激進語言改革主要涉及四個特點：一，對國家標準普通話的提升，以達到超越中國民族之間的語言差異；二，使拼音能作為代表標準發音的方法；三，簡化文字的發展，以提高識字率和與舊有的語言規則相比下有象徵性的轉變；四，透過登記每個人作為民族羣體的成員身分以至對種族多樣性作出分類和規範。在這個模型上，鑑於個人和羣體之間的關係是由國家設計的，母語在語言上的浪漫主義並沒有明確位置。新加坡在語言政策上的「雙語政策」便是一個清晰的類比。在新加坡，儘管母語與民族羣體的成員資格有關，它卻不是在家裏實際使用的語言。這意味着普通話是中國籍新加坡人的母語，而這與他們在家裏說什麼種類的漢語，或者在家裏是否使用英語無關。儘管廣東話並不是每個香港中

國人的母語，它卻被理解為是現今香港人的母語，也主要被視為口頭語言上的母語。基於其重要性，筆者相信是有需要更深入了解這一詞在香港和更廣泛的中國的歷史和發展。

## 存在於香港的語言政治

廣東話在歷史上是屬於一個高度不穩定的類別。這反映了它與19世紀後期中國語言現代化的複雜性，西方語言理論化以及語言意識形態的影響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諷刺的是，「廣東話」一詞是由英語詞彙「Cantonese」鞏固其地位的。半查以來，大量與英語「Cantonese」有着相似意思的術語都被人們使用着。有些純粹是歷史性的，有些是在殖民地詞典中被發現，有些只是非正式的，也有數個是指定香港粵語應作為一個獨特的種類。下表顯示了一些術語（它是由關鍵概念組織，因此一些術語會多次出現）：

粵 Yue	話 spoken variety	語 language	方言 dialect	廣府 Guangzhou / Canton
粵語 粵語方言 粵文 香港粵語 港式粵語	廣府話 省城話 唐話 白話 本地話 廣東話 廣州話 香港話 港式廣東話	粵語 香港語 香港母語	廣州方言 粵語方言 香港方言	廣府話

廣東 Guangdong	廣州 Guangzhou / Canton	香港 Hong Kong	港式 Hong Kong style	母語 mother tongue
廣東省土話 廣東話	廣州話 廣州方言	香港母語 香港人(的) 母語 香港語	港式粵語 港式廣東話	香港母語 香港人(的) 母語
文 written language				
中文 粵文				

早在中國的語言改革運動之前，香港已在1842年正式成為殖民地，並走上語言現代化之路。在香港教育的歷史上，使用本地的所謂「方言」（主要是粵語），是與基督教（新教）學校和機構有關，例如香港培正中學。而香港的反殖民語言民族主義最晚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在後殖民時代，即從60年代到97年，母語的問題主要出現在教育方面。這是因為中文／廣東話在學校的使用與英語在香港的商業、政府和體制結構上的重要性形成衝突。廣東話成為一個強大的娛樂產業媒介和一個獨特的、本土的香港身分基礎：「香港人」。在20世紀70年代，社會對不斷增加中文在政府（特別在與公眾的溝通方面）、教育和法律（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或中文運動）的重要性上給予更多的壓力。主要人物之一是司徒華。這種意識形態的組成，如殖民主義和英語在廣東話／中文的主導地位的語言政治辯論，現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辯論重心已經從關於英語對教育制度的負面影響和「母語教育」在廣東話中的優點，轉移到對普通話和簡體字的角色問題討論上。

政府曾表示長遠目標是把所有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課程都以普通話授課。政府倡導普通話教學語言 PMI (putonghua medium of instruction) 是因為他們認為現代中文與口語普通話更為接近。因此，當學生使用母語 (廣東話) 時，他們在切換口語和書寫模式時必須轉換語言 (switch-codes)。諷刺的是，即使在現今香港社會只有少數中國人說普通話，這支持普通話的論據卻是引用了「我手寫我口」的概念 (Chan 2015)。與此同時，所謂的「書面粵語」繼續在香港社會的體制結構之外蓬勃發展。書面粵語實際上是擁有不同於標準的中文書寫的廣泛風格，它能反映粵語的影響，當中包括聖經的翻譯、粵語歌劇、木魚書，以及所謂的「三發第」(Snow 2004)。戰後，從某些香港漫畫的對話中可以發現到由香港俚語寫成的粵語。小說方面也有粵語作品，例如黃谷槐 1947 年開始寫的《蝦球傳》(連載版，非修訂版)。<sup>1</sup> 除此以外，直至 90 年代的電影小標題、報紙直接報導的對話和一些法律訴訟中也有「書面粵語」。現在這些「書面粵語」大量出現在網上論壇、社交媒體、手機文本、藝術品，並在政治抗議中發揮關鍵作用。

語言標籤背後的政治因素反映了更多的矛盾和意識形態的衝突。使用「母語」一詞來代表廣東話，以及將廣東話標示為「方言」或「語言」皆反映了香港作為政治和社會文化空間具爭議性的地位。語言政治在公共領域上與有關香港和中國治理體系和語言政策的關係是難以分割的。香港基本法官方中文版本中的「第九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

---

1 此方面可以參考樊善標著：〈粵語入文與雅俗界線——以 1950、60 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為考察對象〉，載文潔華編：《香港嘅廣東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頁 2-23。此書有很多相關論述。

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在英文中是這樣寫（第9條）：「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English may also be us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by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legislature and judiciar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仔細看看，文句中並沒有明確指出什麼是中文。本文慣常把中文和英文理解成為共同官方語言，即使以上兩個文本均以不同方式表示了中文為主要語言，並可以解讀成英語最多只能成為官方輔助語言。自1997年轉型以來，廣東話與書面中文在法院制度中是較英語重要的；在立法局，大多數口頭事項都是用粵語處理；相反，英語的使用是作為一種代表抗議的語言。

在香港，母語至今仍然是一個關鍵概念，並跟普通話與國家建設有關的語言形成對比。香港政治不斷轉變的局面導致政治嚴重分化。即使香港的統治階層和標準化的中國政治和文化（包括語言）價值觀關係越趨密切，政治的嚴重分化亦促使越來越多「地方主義者」承擔起捍衛廣東話地位的責任。「我手寫我口」的原則再加上母語，能更確切地表達內心的想法：

其實理由好簡單，因為用文言文或者北方白話文，根本冇法完美咁表達我哋心入面嘅說法同感受。每個人一出世學識母語之後，佢就會用佢嘅母語思考，所以一切喜怒哀樂，都係用母語作為基礎。當我哋寫文，往往要係腦入便進行一次翻譯，變成北方話為主體嘅官話白話文。係翻譯之後，無論文法、語氣、用詞都截然唔同。相信大家都有試過，如果你朋友突然用「書面語」同你講嘢，你往往會覺得一定發生咗某啲事，令到佢語氣非常

嚴肅認真。係日常交流範疇，官話白話文並非我哋常用嘅語境 (language register)。(港語學 2014)

在2016年1月，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建議將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而他的理據是因為粵語並不是每個人的母語，他認為這可以提升中文讀寫能力 (Ejnsight 2016)。一位網上評論員卻建議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是應該以英語作教學語言，因為在香港說英語的人是較說普通話的多：「用英文都多過講普通話嘅人。咁講應該用英文作母語，唔係個個人母語都係普通話架嘛」(手手手2016)。

隨着迅速變化的政治環境，提倡母語的權利所包含之含義也隨之改變。對於司徒華和他那一代的中國民族主義支持者來說，中文的承認意味着同時使用口語廣東話和現代書面中文。廣東話曾經與普通話位於同一水平。然而時至今天，以最激進的立場為例，有人認為如果「香港不是中國」和「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那麼香港廣東話就不是中文，甚至不是廣東話；香港人講嘅係香港語 (Hongkongese) 不是廣東話 (m2.hkgolden.com)。縱然這是少數香港人的看法，但令人矚目的是，竟有人會表達出如此的想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語言規劃的目標是標準化和集中化，這可從中共政府把說中文的人單一歸類為漢族中所呈現。這也是列寧減低差異性和加強國家權威的一部分。相比之下，香港因為其英國殖民地的身分而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言改革之內。隨後的殖民地政府在沒有任何明確的政策目標或明確表達的意識形態情況下，則遇到諸如教學語言等問題。香港社會要求對其本地語言的承認，與此同時又要求參與以英語為主的政府、公務員制度、法律和商業領域的權利。通過鎮壓、冷漠、忽視和承認的矛盾結合，英國殖民主

義為香港提供了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內，香港為廣東話成為主要的方言和母語政治身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台。因此在香港歷史上，粵語和英語之間的關係是充滿矛盾和競爭，但當中也存在着共生的空間。

母語的概念及其強大的情感和意識形態，困擾着那些嘗試把香港融入到中國更廣泛的民族政治結構的人們。有人可能認為母語政治是西方不真實的輸入，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香港的語言問題似乎是殖民地的分治策略的結果，這亦提出了為人熟悉的後殖民所衍生有關自治獨立的問題。但中國在語言和民族方面的政策皆是在蘇聯的直接影響下形成的，其語言政策是沒有真正的依據。值得我們深究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語言會是怎樣？隨着民主改革的希望逐漸減退，這個問題可能最終只會成為歷史話題。

## 參考文獻

### 英文

- Chan, Yuen. "Mother Tongue Squeezed out of the Chinese Classroom in Cantonese-speaking Hong Kong." *Hong Kong Free Press*, July 22, 2015.
- Ejinsight. "Antony Leung Proposal on Teaching Putonghua in Schools Attacked." Jan 11, 2016, <http://www.ejinsight.com/20160111-antony-leung-proposal-teaching-putonghua-in-schools-attacked/> (擷取日期：2017年1月15日)。
- Snow, Don.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中文

手手手評論：〈用英文都多過講普通話嘅人咁講應該用英文作母語〉，香港高登，2016年11月1日，<https://m.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6206402&type=CA&page=1> (擷取日期：2017年1月15日)。

港語學撰：〈我哋需要一場粵語新文化運動〉，《熱血時報》，2014年5月3日，[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3-05-2014/9337](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3-05-2014/9337) (擷取日期：2017年1月15日)。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